

容齋隨筆



(三)

卷之三

未作

水者爲積水所成積水會能微增水之稟力何故

也言上古巢居穴處飲食血宋洪迈著北京燕山出版社

禡精毛羽時人質樸文章未作達

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

繩生焉濟曰太古結繩以理達及伏羲畫八卦代結繩由是

人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

有變失常也人文禮樂典謂化下使成理

文之時

直輪爲大略路之始大

容
斋
隨
筆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〔宋〕洪迈 著 第三册



第三卷

兔葵燕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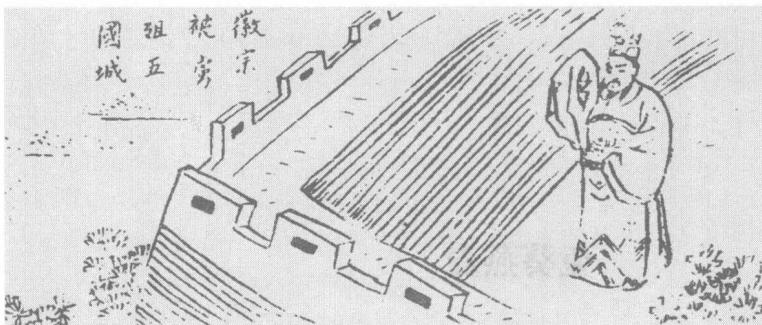
刘禹锡《再游玄都观诗序》云：“唯兔葵燕麦，动摇春风耳。”今人多引用之。予读《北史·邢邵传》，载邵一书云：“国子虽有学官之名，而无教授之实，何异兔丝燕麦，南箕北斗哉？”然则此语由来久矣。《尔雅》曰：“蕎，兔葵。籥，雀麦。”郭璞注曰：“颇似葵而叶小，状如藜；雀麦即燕麦，有毛。”《广志》曰：“菟葵，爚可食。”古歌曰：“田中兔丝，何尝可络？道边燕麦，何尝可获？”皆见于《太平御览》。《上林赋》：“葴析芭荔。”张揖注曰：“析，似燕麦，音斯。”叶庭珪《海录碎事》云：“兔葵，苗如龙芮，花白茎紫。燕麦草似麦，亦曰雀麦。”但未详出于何书。

〔译文〕刘禹锡《再游玄都观诗序》说：“只有菟葵、燕麦，在春风中摇动罢了。”今人经常引用它。我读《北史·邢邵传》，载有邢邵一篇奏书说：“国子先生虽然有学官的称号，但没有教授的实学，与兔丝燕麦、南箕北斗有什么区别呢？”那么这话由来已久了。《尔雅》说：“蕎，菟葵；籥，雀麦。”郭璞注释说：“很像葵但叶子小，形状像藜；雀麦就是燕麦，有毛。”《广志》说：“菟葵，用火烤了可以吃。”古代的歌谣说：“田中兔丝，何时可曾网络？路边燕麦，何时可曾收获？”都见于《太平御览》。《上林赋》有“葴析芭荔”的话。张揖注释说：“析，好像燕麦，读音为斯。”叶庭珪的《海录碎事》说：“兔葵，苗像龙芮，花为白色，茎为紫色。燕麦草像麦，也叫雀麦。”但不清楚这种说法源于哪本书。

北狄俘虏之苦

元魏破江陵，尽以所俘士民为奴，无问贵贱，盖北方夷俗皆然也。自靖康之后，陷于金虏者，帝子王孙，宦门仕族之家，尽没为奴婢，使供作务。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，令自春为米，得一斗八升，用为糇粮。岁支麻五把，令缉为裘，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人。男子不能缉者，则终岁裸体，虏或哀之，则使执爨，虽时负火得暖气，然才出外取柴，归再坐火边，皮肉即脱落，不日辄死。惟喜有手艺，如医人、绣工之类，寻常只团坐地上，以败席或芦藉衬之。遇客至开筵，引能乐者使奏技，酒阑客散，各复其初，依旧环坐刺绣，任其生死，视如草芥。先公在英州，为摄守蔡隽言之，蔡书于《甲戌日记》，后其子大器录以相示，此《松漠记闻》所遗也。

〔译文〕北魏攻破江陵后，把俘虏的士人百姓没为奴隶，不论高贵低贱，可能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都是这样。自从靖康之难以后，凡被金朝俘虏的人，不论是帝子王孙，还是宦官之家，全部被没为奴婢，让他们为金人做一些杂活。每人每月支给五斗稗子，让他们自己春成米，得到一斗另八升，作为一个月的干粮。每年支给



版画“宋徽宗被虏至五国城”图。讲述靖康之变，金人掳走宋徽宗、宋钦宗，后来二人都死于五国城之事。

每个人五把麻，让他们自己纺织做衣服，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一分钱一丝帛的收入。男人有的不会纺织的，就整年裸体，金人中有可怜他们的，就让他们烧火煮饭，可以一时靠近火得点暖气，但是刚刚到外面取柴回来，再坐到火旁，皮肉就开始脱落，没过几天就悲惨地死去了。金人只喜欢有手艺的人，如医生、刺绣工一类，这些人平时只团坐在地上，用破席或者芦苇衬在下面。金人遇到客人来了开办筵席，就把懂音乐的领去让他们表演技艺，等筵席结束客人走完后，再让她们各自回到原来的位子上，依旧围坐成一圈刺绣，不管她们的死活，就像对待草芥一样。我已故的父亲在英州时，对英州代知州蔡窝谈了这些事，蔡窝把它写在《甲戌日记》中，他的儿子蔡大器录下来拿给我看，都是《松漠记闻》中所遗漏未记的内容。

太守刺史赠吏民官

汉薛宣为左冯翊，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，未及召，立妻受囚家钱，慚恐自杀。宣移书池阳曰：“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，以显其魂。”颜师古注云：“以此职追赠也。”后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吴悉达兄弟行著乡里，板赠其父渤海太守。此二者皆以太守、刺史而擅赠吏民官职，不以为过，后世不敢然也。

〔译文〕汉朝薛宣任左冯翊时，池阳太守推荐廉吏狱掾王立，还没来得及召见，这时王立的妻子收受囚犯家属的钱财，王立因羞愧恐惧而自杀了。薛宣向池阳发出公文说：“把府决曹掾这个官职书写在王立的灵柩上，以安慰他的灵魂。”颜师古注释说：“这是用府决曹掾这个官职追赠王立。”南北朝时，北魏并州刺史由于属下百姓吴悉达兄弟几人的品行闻名乡里，便追赠他们的先父为渤海太守。这两件事都是以太守、刺史的身份擅自追赠官吏平民官职，可以说不算是一种错误的行为，但后世没有敢仿效的。

李元亮诗启

建昌县士人李元亮，山房公择尚书族子也，抱材尚气，不以辞色假人。崇宁中在大学，蔡薿为学录，元亮恶其人，不以所事前廊之礼事之。蔡擢第魁多士，元亮失意归乡。大观二年冬，复诣学，道过和州。蔡解褐即超用，才二年，至给事中，出补外，正临此邦。元亮不肯入谒。蔡自到官，即戒津吏门卒，凡士大夫往来，无论官高卑，必飞报，虽布衣亦然。既知其来，便命驾先造所馆。元亮惊喜出迎，谢

曰：“所以来，颛为门下之故。方修贽见之礼，须明旦扣典客，不意给事先生卑躬下贱如此，前贽不可复用，当别撰一通，然后敬谒。”蔡退，元亮旋营一启，旦而往焉，其警策曰：“定馆而见长者，古所不然；轻身以先匹夫，今无此事。”蔡摘读嗟激，留宴连夕，赠以五十万钱，且致书延誉于诸公间，遂登三年贡士科。元亮亦工诗，如“人闲知昼永，花落见春深”，“朝雨未休还暮雨，腊寒才过又春寒”，皆佳句也。

[译文] 建昌县士人李元亮，是李公择尚书的同族侄子，恃才傲物，在辞色方面从来都不知谦让，徽宗崇宁年间在太学就读，蔡薿担任太学学录，李元亮讨厌这个人，就不以事奉学官的礼节对待他。很多学子都被蔡薿推荐做了大官，而李元亮则失意还乡。徽宗大观二年（公元1108年）冬天，他再次赴太学求学，路过和州。这时蔡薿已被重用，不到两年，已官至给事中，出补外任，正巧担任和州知州。李元亮不肯去拜谒他。蔡薿自从到和州上任后，就告诫津吏和门卒，凡是士大夫求见的，不论官位高低，一定要马上禀报，即使是没有官职的布衣之士也一样看待。蔡薿得知李元亮来到和州，便先到李氏居住的旅馆拜访。见到蔡氏前来拜访他，李元亮惊喜地出外迎接，感激地说：“学生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专门拜谒先生。正在准备进见的礼物，打算明天去拜谒您，没想到先生卑恭谦和到这种地步，先前的礼物不能再用了，应当另外撰写一些，然后恭敬地拜谒您。”蔡薿回去后，李元亮立即写了一篇启，天一亮就到蔡府去，启中写道：“确定好住处，才去拜谒长官大人，自古遭到人非议；放下官架子主动看望寒士，当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。”蔡薿读了这两句话嗟叹感激，连续好几天设宴招待，又赠送李元亮五十万钱，并且向各位达官显贵写信推荐赞誉他，于是李元亮立即登上了大观三年的贡士科。李元亮的诗歌也很工整，如“人闲知昼永，花落见春深”，“朝雨未休还暮雨，腊寒才过又春寒”，都是佳句。

元魏改功臣姓氏

魏孝文自代迁洛，欲大革胡俗，既自改拓跋为元氏，而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，以姓或重复，皆改之。于是拔拔氏为长孙氏，达奚氏为奚氏，乙旃氏为叔孙氏，丘穆陵氏为穆氏，步六孤氏为陆氏，贺赖氏为贺氏，独孤氏为刘氏，贺楼氏为楼氏，勿忸于氏为于氏，尉迟氏为尉氏，其用夏变夷之意如此。然至于其孙恭帝，翻以中原故家，易赐蕃姓，如李弼为徒河氏，赵肃、赵贵为乙弗氏，刘亮为侯莫陈氏，杨忠为普六茹氏，王雄为可频氏，李虎、阎庆为大野氏，辛威为普毛氏，田宏为纥干氏，耿豪为和稽氏，王勇为库汗氏，杨绍为叱利氏，侯植为侯伏侯氏，窦炽为纥豆陵氏，李穆为拔拔氏，陆通为步六孤氏，杨纂为莫胡卢氏，寇隽为若口引氏，段永为尔绵氏，韩襄为侯品陵氏，裴文举为贺兰氏，王轨为乌丸氏，陈忻为尉迟氏，樊深为万纽于氏，一何其不循乃祖彝宪也！是时盖宇文泰颛国，此事皆出其手，遂复国姓为拓跋，而九十九姓改为单者，皆复其旧。泰方以时俗文敝，命苏绰仿《周书》作大诰，又悉改官名，复周六卿之制，顾乃如是，殆不可晓也。

[译文] 北魏孝文帝把都城从代迁到洛阳后，打算大刀阔斧革除胡人风俗，他把自己的国姓拓跋氏改为元氏，各个功臣旧族凡从代迁到洛阳的，只要是复姓，都要全部更改。于是拔拔氏改为长孙氏，达奚氏改为奚氏，乙旃氏改为叔孙氏，丘穆

陵氏改为穆氏，步六孤氏改为陆氏，贺赖氏改为贺氏，独孤氏改为刘氏，贺楼氏改为楼氏，勿忸于氏改为于氏，尉迟氏改为尉氏，由此可知，他用汉族风俗改变少数民族风俗的决心是多么坚定。然而到了他的孙子恭帝时，反而把居住在中原的汉族世家赏赐给少数民族的姓，如李弼赐给徒河氏，赵肃、赵贵赐给乙弗氏，刘亮赐给侯莫陈氏，杨忠赐给普六茹氏，王雄赐给可频氏，李虎、净庆赐给大野氏，辛威赐给普毛氏，田宏赐给纥干氏，耿豪赐给和稽氏，王勇赐给库汗氏，杨绍赐给叱利氏，侯植赐给侯伏侯氏，窦炽赐给纥豆陵氏，李穆赐给擒拔氏，陆通赐给步六孤氏，杨纂赐给莫胡卢氏，寇隽赐给若口引氏，段永赐给尔绵氏，韩襄赐给侯吕陵氏，裴文举赐给贺兰氏，王轨赐给乌丸氏，陈忻赐给尉迟氏，樊深赐给万纽于氏，这是多么违背他祖宗的遗训呀！这个时候是宇文泰执掌大权，这种赐姓的事都是由他提出和办理的，随即恢复国姓为拓跋氏，并且原来九十九个改为单姓的复姓，也全部恢复了旧姓。宇文泰还认为当时流行的骈体文有流弊，命令苏绰模仿《周书》作大诰，同时更改官名，恢复周朝的六卿制。宇文泰这种胡改乱改的做法，实在令人费解。

东坡和陶诗

《陶渊明集·归园田居》六诗，其末“种苗在东皋”一篇，乃江文通杂体三十

篇之一，明言效陶征君《田居》，盖陶之三章云：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”故文通云：“虽有荷锄倦，浊酒卿自适。”正拟其意也。今陶集误编入，东坡据而和之。又“东方有一士”诗十六句，复重载于《拟古》九篇中，坡公遂亦两和之，皆随意即成，不复细考耳。陶之首章云：“荣荣窗下兰，密密堂前柳。初与君别时，不谓行当久。出门万里客，中道逢嘉友。未言心先醉，不在接杯酒。兰枯柳亦衰，遂令此言负。”坡和云：“有客扣我门，系马庭前柳。庭空鸟雀噪，门闭客立久。主人枕书卧，梦我平生友。忽闻剥啄声，惊散一杯酒。倒裳起谢客，梦觉两愧负。”二者金石合奏，如出一手，何止子由所谓遂与比辙者哉！

[译文]《陶渊明集》中《归园田居》共有六首诗，其中最后“种苗在东皋”一篇，是江淹的杂体诗三十篇中的一篇，江淹明确指出这



陶渊明像，图选自清·顾元熙《古圣贤像传略》。

首诗是仿效陶征君《归园田居》的，陶渊明这组诗第三章说：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”因此江淹诗说：“虽有荷锄倦，浊酒聊自适。”正是仿照陶诗诗意。现在的《陶渊明集》把这首诗误编进去了，而苏东坡以陶集为依据和了这首诗。又如“东方有一士”诗十六句，又重复载在《拟古》诗九篇当中，苏东坡也就在这两个地方写了和诗，都是随意地写成的，没有仔细考订。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第一章写道：“荣荣窗下兰，密密堂前柳。初与君别时，不谓行当久。出门万里客，中道逢嘉友。未言心先醉，不在接杯酒。兰枯柳亦衰，遂令此言负。”东坡和道：“有客扣我门，系马庭前柳。庭空鸟雀噪，门闭客立久。主人枕书卧，梦我平生友。忽闻剥啄声，惊散一杯酒。倒裳起谢客，梦觉两愧负。”这两首诗可算得上是金石合奏，好像是同一个人写成的，根本不是东坡之弟苏子由所说的仅仅和辙同韵而已！

孔戣 郑穆

唐孔戣在穆宗时为尚书左丞，上书去官，天子以为礼部尚书致仕。吏部侍郎韩愈奏疏曰：“戣为人守节清苦，议论正平，年才七十，筋力耳目，未觉衰老，忧国忘家，用意至到。如戣辈，在朝不过三数人，陛下不宜苟顺其求，不留自助也。”不报。明年正月，戣薨。国朝郑穆在元祐中以宝文阁待制兼国子祭酒请老，提举洞霄宫，给事中范祖禹言：“穆虽年出七十，精力尚强，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，有不得谢，则赐之几杖，祭酒居师资之地，正宜处老成，愿毋轻听其去。”亦不报。然穆亦至明年卒。二事绝相类。

〔译文〕唐朝的孔戣在穆宗时任尚书左丞，上书请求离任，皇上以他为礼部尚书的身份退休。吏部侍郎韩愈上奏疏说：“孔戣为人守节操而清苦，议论正直平和，年纪才七十，筋骨和耳目未觉衰老，他忧国忘家，用心周到。像孔戣这样的人在朝廷中不过三几人，陛下不应该随便顺应他的请求，不挽留他以帮助自己。”穆宗不答复。第二年正月，孔戣去世。本朝郑穆在元祐年间以宝文阁待制兼国子祭酒的身份请求告老还乡，以他提举洞霄宫。给事中范祖禹说：“郑穆虽然年纪超过七十，但精力还强健，古代的大夫七十岁而退休，有不能退的，就赐给他几案和手杖。国子祭酒身居师长的地位，正好应该安置老成之人，希望不要轻易听任他离去。”也没有答复。然而郑穆也到第二年就去世了。这两件事极为相似。

陈季常

陈慥字季常，公弼之子，居于黄州之岐亭，自称“龙丘先生”，又曰“方山子”。好宾客，喜畜声妓，然其妻柳氏绝凶妒，故东坡有诗云：“龙丘居士亦可怜，谈空说有夜不眠。忽闻河东师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”河东师子，指柳氏也。坡又尝醉中与季常书云：“一绝乞秀英君。”想是其妾小字。黄鲁直元祐中有与季常简曰：“审柳夫人时须医药，今已安平否？公暮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，姬媵无新进矣，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？”又一贴云：“承谕老境情味，法当如此，所苦既不妨游观山川，自可损药石，调护起居饮食而已。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，一任放不解事

邪？”则柳氏之妒名，固彰著于外，是以二公皆言之云。

[译文] 陈慥字季常，是陈公弼的儿子，居住在黄州的岐亭山，自称“龙丘先生”，又叫“方山子”。这个人喜欢交朋友，喜欢畜养歌妓，然而他的妻子柳氏却十分凶恶，喜欢妒忌别人，所以苏东坡有诗说：“龙丘居士亦可怜，谈空说有夜不眠，忽闻河东师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”河东狮子，所指就是柳氏。苏东坡又曾在醉中给陈季常写信说：“寄一首绝句求得到秀英君。”秀英可能是陈季常妾的乳名。黄庭坚在哲宗元祐年间有写给陈季常的书简，说：“听说柳夫人生病很久了，现在已康复了吗？您晚年想寻求清静的生活乐趣，如果不拈花惹草，那么柳夫人还有什么烦恼导致生病呢？”又有一帖写道：“承蒙您告诉老境的情趣，应当按照您说的去做，苦闷时就去饱览山川风光，使心胸开阔。自然就可以少生病，再注意调整起居饮食就可以了。河东夫人也能哀怜您年岁已高，由着您放纵不通世故吗？”可见柳氏的妒名，早就彰明较著了，所以苏轼、黄庭坚两个人都说到这件事。

文用谥字

先王溢以尊名，节以壹惠，故谓为易名。然则溢之为义，正训名也。司马长卿《谕蜀文》曰：“身死无名，溢为至愚。”颜注云：“终以愚死，后叶传称，故谓之溢。”柳子厚《招海贾文》曰：“君不返兮溢为愚。”二人所用，其意则同。唯王子渊《箫赋》曰：“幸得溢为洞箫兮，蒙圣主之渥恩。”李善谓：“溢者号也，言得溢为箫而常施用之。”以器物名为溢，其语可谓奇矣。

[译文] 先王死后溢一个尊贵的名号，节以壹惠，因此叫做换名。可见溢的本义，目的是为了端正名实。汉司马相如的《谕蜀文》说：“到死也没有出名，死后求溢的行为叫做‘至愚’。”颜师古注释说：“最后因为愚蠢而死，后世便这样称呼他，所以叫作溢”。唐代柳宗元《招海贾文》说：“君一去不返死在那里，把你称作愚。”这里两个人所用“溢”字的意思是相同的。只有王子渊的《箫赋》说：“有幸起名叫‘洞箫’，承蒙圣主优渥的恩泽。”李善说：“溢，就是号的意思，是说得以溢为洞箫而常使用它。”用器物的名字做“溢号”，可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了。

高唐神女赋

宋玉《高唐》、《神女》二赋，其为寓言托兴甚明。予尝即其词而味其旨，盖所谓发乎情，止乎礼义，真得诗人风化之本。前赋云：“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云气，问玉曰：‘此何气也？’对曰：‘所谓朝云者也。昔者先生尝游高唐，梦见一妇人，曰，妾巫山之女也，愿荐枕席。王因幸之。’”后赋云：“襄王既使玉赋高唐之事，其夜王寝，梦与神女遇，复命玉赋之。”若如所言，则是王父子皆与此女荒淫，殆近于聚麀之丑矣。然其赋虽篇首极道神女之美丽，至其中则云：“淡清静其愔嫕兮，性沉祥而不烦。意似近而若远兮，若将来而复旋。褰余帱而请御兮，愿尽心之倦倦。怀贞亮之洁清兮，卒与我乎相难。颠薄怒以自持兮，曾不可乎犯干。欢情未接，将辞而去。迁延引身，不可亲附。愿假须臾，神女称遽。暗然而冥，忽不知处。”然则神女但与怀王交御，虽见梦于襄，而未尝及乱也。玉之意可谓正矣。今

人诗词，顾以襄王藉口，考其实则非是。嬃音仄零反，敛容怒色也。柳子厚《谪龙说》有“奇女嬃尔怒”之语，正用此也。

[译文] 战国时期的作家宋玉的《高唐赋》和《神女赋》，是两篇有所寄托的寓言。我曾经根据文章分析作者写作的意图，可以说作品从写男女之情开始，却以引导人们懂得礼义结尾，宋玉真正领会了《诗经》作者有益“风化”的精髓。前一篇赋写道：“楚襄王看见云梦高唐台上有云气，就问宋玉说：‘这是什么气呀？’宋玉回答说：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朝云。先王（指襄王父怀王）曾经巡游高唐，梦见了一位女子，女子说，我是巫山上的神女，非常愿意和您共度枕席之欢。于是先王就宠幸了那个女子。’”后一篇则写道：“楚襄王让宋玉写下了高唐的浪漫故事，当晚睡在床上后，便在梦中与那位神女相遇了，醒来后又让宋玉写下了这件事。”如果事实真如上面所说的那样，则怀王和襄王父子二人都和这位女子淫乱了，这差不多和群兽乱交一样丑陋。赋

的开头虽然极力描写神女的美丽，但到了中间却写道：“（这女子）恬淡清静而和善，性情沉静安详而不躁。她好像离我很近又好像很遥远，好像要翩翩到来又好像要马上离去。她用纤手撩开我的车帷请求我能载着她，我渴望向她奉献真诚的心怀。她怀有贞洁明亮的节操，终究与我相为难。她收敛笑容满面怒容以维护尊严，使我不敢冒犯她。欢情不能融洽，她却要告辞离去。我退却避开，不敢亲昵偎依。心中唯愿留住这短暂的美好时光，神女却骤然离开。突然眼前一片黑暗，已不知她飘向何处。”由此可见神女只与楚怀王交媾，虽然在梦境中也见到楚襄王，却没有走到淫乱那一步。宋玉表达的意旨可算是纯正了。当代人的诗词，反以楚襄王的事为借口，认为事实并不是这样。嬃，由足零反切，收敛笑容而发怒的意思。柳宗元的《谪龙说》中有“奇特的女子收敛笑容怒视着你”，正是用的这个词。



巫山神女像，图出自《百美新咏》。巫山神女是宋玉的《高唐》、《神女》二赋中虚构的人物。

其言明且清

《礼记·缁衣》篇：“诗云，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。国家以宁，都邑以成，

庶民以生。谁能秉国成？不自为正，卒劳百姓。”郑氏注不言何诗。今《毛诗·节南山》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。《经典释文》云：“从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，今诗皆无此语，或皆逸诗也。”予案《文选》张华《答何劭》诗曰：“周任有遗规，其言明且清。”然则周任所作也。而李善注曰：“子思子诗云，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。”世之所存《子思子》亦无之，不知善何所据？意当时或有此书，善必不妄也，特不及周任遗规之义，又不可晓。

[译文]《礼记·缁衣》篇说：“有一首诗说：‘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。国家以宁，都邑以成，庶民以生。谁能秉国成？不自为正，卒劳百姓。’”汉代郑玄的注释没有指明这是一首什么诗。如今的《毛诗·节南山》中有上面那首诗的最后三句而且稍微有些不同。《经典释文》说：“从第一句到庶民以生五句，现在《诗经》中都没有这些话，可能是一段逸诗。”《昭明文选》中张华《答何劭》诗说：“周任有遗规，其言明且清。”由此可以判断出上面那首诗是古代史官周任作的。而李善注释张华这首诗说：“子思子诗说：‘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。’”如今存世的《子思子》也没有记载李善说的这两句诗，不知道李善的依据是什么？我想当时可能真的存在着这本书，李善绝对不会胡乱注释，他只是没有解释“周任遗规”的意思，而我们又不能了解。

侍从转官

元丰未改官制以前，用职事官寄禄。自谏议大夫转给事中，学士转中书舍人。历三侍郎、学士转左曹礼、户、吏部，馀人转右曹工、刑、兵部。左右丞，吏侍郎转左，兵侍郎转右。然后转六尚书，各为一官。尚书转仆射，非曾任宰相者不许转，今之特进是也。故侍从止于吏书，由谏议至此凡十一转。其庶僚久于卿列者，则自光禄卿转秘书监，继历太子宾客，遂得工部侍郎。盖以不带待制以上职，不许入两省给、谏耳。元丰改谏议为太中大夫，给、舍为通议，六侍郎同为正议，左右丞为光禄。兵、户、刑、礼、工书同为银青，吏书金紫。但六转，视旧法损其五。元祐中以为太简，增正议、光禄、银青为左右，然亦才九资。大观二年，置通奉以易右正议，正奉以易右光禄，宣奉以易左光禄，以右银青为光禄，而至银青者去其左字，今皆仍之。比仿旧制，今之通奉，乃工、礼侍郎、正议乃刑、户，正奉乃兵、吏，宣奉乃左右丞，三光禄乃六尚书也。凡侍从序迁至金紫无止法，建炎以前多有之。绍兴以来，阶官到此绝少，唯梁杨祖、葛胜仲致仕得之。近岁有司不能探赜典故，予以宣奉当磨勘，又该覃霈，颜师鲁在天官，径给回授一据，而不明言其所由。比程叔达由宣奉纳禄不迁官，而于待制阁名升二等。程大昌亦然，以龙图直学士径升本学士，尤非也。予任中书舍人日，已阶太中，及以集英修撰出外，吏部不复为理年劳，凡十八年，始以待制得通议，殊可笑。盖台省之中，无复有老吏矣。

[译文]神宗元丰年间没有改革官制之前，往往是按职事官位的高低发给俸禄。从谏议大夫转给事中，大学士转中书舍人。担任过三部侍郎、大学士的转左曹的礼部、户部、吏部，其余的人转右曹的工部、刑部、兵部。左右丞，吏部侍郎转左丞，兵部侍郎转右丞。以后转六部的尚书，各为一官。尚书转仆射，没有担任过宰相职务的不许转，现在的特进就是指仆射这种官职。所以侍从转到吏部尚书就结束

了，从谏议大夫到此共有十一转。一般官僚长时间担任卿职的，则从光禄卿转秘书监，然后经过太子宾客，最终可得到工部侍郎的职位。只要没有担任过待制以上官职的，不能够在尚书省、中书省中任给事中、谏议大夫。元丰年间改谏议大夫为太中大夫，给事中、中书舍人改为通议大夫，六部侍郎一起称为正议大夫，左右丞改为光禄大夫。兵部、户部、刑部、礼部、工部各尚书左右丞都改为银青，吏部尚书左右丞改为金紫。这样一来只剩下六转，比旧的制度少了五转。哲宗元祐年间认为六转太简略了，又把正议大夫、光禄大夫、银青增加为左右两员，也才有九转。徽宗大观二年的时候（公元1108年），设置通奉大夫以改换右正议大夫，设正奉大夫以更换右光禄大夫，设宣奉大夫来替换左光禄大夫，以右银青为光禄大夫，而官位做到银青的去掉左字，如今仍沿用。与旧的制度相比，如今的通奉大夫，相当于过去的工部、礼部侍郎，正议大夫相当于过去的刑部、户部侍郎，正奉大夫相当于过去的兵部、吏部侍郎，宣奉大夫相当于旧时的左右丞，三种光禄大夫相当于旧时的六部尚书。凡是侍从按次序升迁金紫左右丞的没有限制条文，高宗建炎年间以前就有了这一规定。高宗绍兴年间以后，阶官达到金紫地步的很少很少，只有梁扬祖、葛胜中辞官离休后才得到这个官阶。近年有关部门不审慎考察典章，我以宣奉大夫的职位当磨勘，又受家恩，颜师鲁任天官，直接加授一官阶，又不说明加官阶的原因。程叔达任宣奉大夫领俸禄却不升官阶，而在待制阁中的品名又升二等。程大昌也是这样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的阁官直接升为龙图阁学士，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我任中书舍人时，官阶已达到太中大夫，等到以集英殿修撰的身份外任的时候，吏部不再考虑我的工作年限，我共任职十八年，才以待制的身份得到通议大夫的官职，想想真是可笑。台省当中，没有像我这样的老官了。

曹子建七启

“原头火烧净兀兀，野雉畏鹰出复没。将军欲以巧伏人，盘马弯弓惜不发。地形渐窄观者多，雉惊弓满劲箭加。冲人决起百馀尺，红翎白镞随倾斜。将军仰笑军吏贺，五色离披马前堕。”此韩昌黎《雉带箭》诗，东坡尝大字书之，以为绝妙。予读曹子建《七启》论羽猎之美云：“人稠网密，地逼势胁。”乃知公用意所来处。《七启》又云：“名秽我身，位累我躬。”与佛氏



曹植像。曹植，字子建，曹操第三子。

《八大人觉经》所书“心是恶源，形为罪薮”，皆修己正心之要语也。

[译文]“原头火烧净兀兀，野雉畏鹰出复没。将军欲以巧伏人，盘马弯弓惜不发。地形渐窄观者多，雉惊弓满劲箭加。冲人决起百馀尺，红翎白镞随倾斜。将军仰笑军吏贺，五色离披马前墮。”这是诗人韩愈的《雉带箭》诗，苏东坡用大字把它写出来，认为它是精妙绝伦的诗篇。我读三国曹植的《七启》赋，赋中是这样描写射猎场面的：“围观的人越聚越多，捕捉的网越拉越紧；地形越逼越窄，地势逐渐敛缩。”这时我才知道韩公诗意的出处。《七启》又说：“名誉污损了我的身体，地位拖累了我的身体。”这和佛教的《八大人觉经》所写的“心是罪恶的根源，形体是罪恶的渊薮”如出一辙，都是修己正心的名言。

奸鬼为人祸

晋景公疾病，求医于秦，秦伯使医缓为之，未至，公梦疾为二孺子，曰：“彼良医也，惧伤我，焉逃之？”其一曰：“居肓之上，膏之下，若我何？”医至，曰：“疾不可为也。”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，驰召名医许智藏，俊梦亡妃崔氏泣曰：“本来相迎，如闻许智藏将至，其人当必相苦，奈何！”明夜复梦，曰：“吾得计矣，当入灵府中以避之。”及智藏至，诊俊脉，曰：“疾已入心，不可救也。”二奸鬼之害人，如出一辙。近世许叔微家一妇人，梦二苍头，前者云：“到也未？”后者应云：“到也。”以手中物击一下，遂魇。觉后心痛不可忍，叔微以神精丹饵之，痛止而愈。此事迹与上二者相似。

[译文]晋景公得了重病，向秦国求医，秦伯便派名医缓前去为他治病，缓还没有到，晋景公梦见疾病是两个小孩，一个小孩说：“缓是名医，担心他伤害了咱们，怎么躲开他呢？”其中一个小孩说：“藏在晋景公肓的上面，膏的下面，他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”缓见到晋景公，诊治说：“病治不好了。”隋文帝杨坚的儿子秦孝王杨俊生病，急忙召名医许智藏诊治，杨俊梦见亡妃崔氏哭着对他说：“本来我是来迎接你的，现在听说许智藏将要到来，他一定要摧残我，怎么办呢！”第二天杨俊又梦见崔氏，她说：“我想出办法了，应当藏到你的心脏中以躲开他。”等到智藏赶到，诊断杨俊的脉相，说：“病已进入内心，我没有办法救治他了。”两个奸鬼的害人方法，如出一辙。近世许叔微家中的一个妇女，梦见两个奴仆，走在前面的那个奴仆问：“到了没有？”后面那个奴仆回答道：“到了。”于是他们就用手里拿的东西向这位妇人的心窝猛刺了过去，这个妇人立刻在噩梦中惊叫。醒来后心脏疼痛无法忍受，许叔微让她服用神精丹，这个妇人的疼痛止住且痊愈了。这件事和上面的两件事差不多。

监司待巡检

今监司巡历郡邑，巡检、尉必迎于本界首，公裳危立，使者从车内遣谒吏谢之，即揖而退，未尝以客礼延之也。至有倨横之人，责桥道不整，驱之车前，使徒步与卒伍齿者。予记张文定公所著《缙绅旧闻》中一事云：“余为江西转运使，往虔州，巡检殿直今保义成忠郎康怀琪，乘舟于三十里相接，又欲送至大庾县，遂与

偕行。及至县驿，驿正厅东西各有一房，予居其左，康处于右。日晚，命之同食，起行数百步，逼暮而退。夜闻康暴得疾，余急趋至康所，康已具舟将归虔，须臾数人扶翼而下，余策杖随之。”观此，则是使者与巡检同驿而处，同席而食，至于步行送之登舟，今代未之见也。

〔译文〕现在的监司到各郡邑去巡察，当地的巡检、尉必定要到本郡邑的边界上去迎候，穿戴整齐肃立在路的两旁，监司从车内命属下致谢，随后地方官便答谢而退回，从没有以招待客人的礼节来对待地方官的。更有高傲专横的监司，因为桥梁路面不平，不方便通行，便把地方官吏驱赶到车子前，让他们徒步走在卒兵公差的队列当中表示惩罚。我记得张文定公所著的《缙绅旧闻》中有一件事说：“我任江西转运使的时候，曾巡视虔州，巡检殿直保义成忠郎康怀琪，乘船赶到三十里外迎接，我离开虔州时，他又要把我送到大庾县，我们就一起出发了。等来到大庾县的驿馆，见驿馆的正厅东西两侧各有一栋客房，我就住进左面那一栋里，康怀琪住在右面那间客房里。天色黑了，我就让他和我共进晚餐，吃过饭我们一起散步，走了数百步，天快黑了才返回。半夜听说康怀琪突然得了急病，我急忙起床来到康的房间，他们已准备好了船要返回虔州去，没过多久，几个人就把康怀琪挽扶到了船上，我拄着拐杖把他们送到船上。”看完这段记载，可以得出使者和巡检同在一个驿馆住宿，同在一张桌上吃饭，至于使者步行送巡检上船，如今是不可能有这种事了。

十二分野

十二国分野，上属二十八宿，其为义多不然，前辈固有论之者矣。其甚不可晓者，莫如《晋·天文志》谓：“自危至奎为娵訾，于辰在亥，卫之分野也，属并州。”且卫本受封于河内商虚，后徙楚丘。河内乃冀州所部，汉属司隶，其它邑皆在东郡，属兗州，于并州了不相干，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，乃安定、天水、陇西、酒泉、张掖诸郡，自系凉州耳。又谓：“自毕至东井为实沈，于辰在申，魏之分野也，属益州。”且魏分晋地，得河内，河东数十县，于益州亦不相干，而雍州为秦，其下乃列云中、定襄、雁门、代、太原、上党诸郡，盖又自属并州及幽州耳。谬乱如此，而出于李淳风之手，岂非蔽于天而不知地乎！

〔译文〕周朝时十二个国家的分界，在天上配属于二十八座星宿，但星名和地名表述的意思不一致，曾经有人对这一问题讨论过。最不能让人明白的，就是《晋书·天文志》中的一段记录了，书上说：“从危星到奎星叫做娵訾，这些星宿在辰时处在亥时的位置上，配属卫，卫国属于并州。但卫国原本被周朝分封在河内的殷墟，后来迁到了楚丘。河内则是冀州的辖区，汉朝时属于司隶校尉管辖，河内的其他城邑位于东郡，属于兗州，和并州毫无关系。而书中并州名下所列的郡名，却是安定、天水、陇西、酒泉、张掖各郡，而这些地方其实是凉州的地盘。书中又说：“从毕星到东井星称为实沈，这些星宿在辰时处在申的位置上，配属魏国，魏国属于益州。战国时魏国瓜分了晋国的地盘，得到了河内、河东数十个县，和益州也没有一点关系，而书中又说雍州是秦国地盘，在雍州名下列了云中、定襄、雁门、代、太原、上党各郡，而实际上以上各郡又都属于并州及幽州。出自唐朝李淳风之手的史书记载错谬混乱到这种程度，这难道不是他对天文地理一无所知吗？

公孙五楼

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后，悉以国事付公孙五楼，燕业为衰。晋刘裕伐之，或曰：“燕人若塞大岘之险，坚壁清野，大军深入，将不能自归。”裕曰：“鲜卑贪婪，不知远计，谓我不能持久，不过进据临朐，退守广固，必不能守险清野。”超闻有晋师，引群臣会议，五楼曰：“吴兵轻果，利在速战，不可争锋，宜据大岘，使不得入。各命守宰，依险自固，焚荡资储，芟除禾苗，使敌无所资。彼侨军无食，可以坐制。若纵使人岘，出城逆战，此下策也。”超不听，裕过大岘，燕兵不出，喜形于色，遂一举灭燕。观五楼之计，正裕之所惮也。超平生信用五楼，独于此不然，盖天意也。五楼亦可谓智士，足与李左车比肩。后世奸妄擅国，以误大事者多矣，无所谓五楼之智也。

[译文] 南燕的慕容超继承皇位后，把国家大事全都交给公孙五楼掌管，于是南燕的霸业慢慢地衰败。东晋大将刘裕讨伐南燕，有人提醒他说“燕国人如果凭借地面广大据守大岘山天险，坚壁清野，那么大部队深入进去后，就会有去无回了。”刘裕说：“鲜卑人目光短浅，考虑问题一定不会这么长远，他们可能认为我们的军队不能长期坚持战斗，他们只不过会进军据守临朐，退守首都广固而已，一定不会坚守大岘天险并清除四野。”慕容超听说东晋军队要来攻打南燕，便召集群臣讨论作战方略，公孙五楼说：“晋兵轻便，他们的优势是速战速决，我们不可以和他们

争胜。应该据守大岘天险，使他们无法深入。然后命各路守军，依照险要地势加固防御工事，焚烧荡毁贮备，清除禾苗庄稼，使晋兵无所依靠。东晋的远征部队没东西可吃，我们就可以静坐制服他们了。如果让他们进入大岘山以内，我们出城迎战，则是下策。”慕容超没有听从。刘裕率大军穿过大岘山，没有遇到南燕部队在此拦截，欣喜若狂，便一举消灭了南燕国。分析公孙五楼的策略，它正是刘裕所害怕的。慕容超平生信任重用公孙五楼，只有这一次没有听从他的意见，结果却亡了国，这或许就是天意吧。公孙五楼也算得上是智谋之士了，足可以和李左车相提并论。后世奸佞擅权把持国政，贻误大事的人有很多，但他们绝没有像上面所说的公孙五楼那样的智谋。



刘裕像，图出自明·天然撰《历代古人像赞》。刘裕是南朝宋武帝，为东晋大将时，曾率兵灭了南燕。

荐士称字著年

汉、魏以来诸公上表荐士，必首及本郡名，次著其年，又称其字。如汉孔融《荐祢衡表》云：“处士平原祢衡，年二十四，字正平”，齐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云：“秘书丞琅邪王暕，年二十一，字思晦”，“前侯官令东海王僧孺，年三十五，字僧孺”是也。唐以来乃无此式。

[译文] 汉、魏以来各位王公大臣上表举荐士人时，首先要提到这个人所在的郡名，然后再写明他的年龄，接着再称呼他的字。如东汉末年孔融作的《荐祢衡表》说：“处士平原人祢衡，年龄二十四岁，字正平”，南朝齐任昉替萧扬州制作荐士表说：“秘书丞琅邪人王暕，年龄二十一岁，字思晦”，“前任侯官县令东海人王僧孺，年龄三十五岁，字僧孺”，使用的都是这种格式。唐朝以后这种格式就不被采用了。

兄弟邪正

王安石引用小人，造作新法，而弟安国力非之。韩绛附会安石制置三司条例以得宰相，而弟维力争之。曾布当元符、靖国之间，阴祸善类，而弟肇移书力劝之。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。

[译文] 北宋王安石任用奸佞之人，编造新法，但是他的弟弟王安国却竭尽全力反对他的这种做法。韩绛支持王安石制置三司条例而得到了宰相的职位，但他的弟弟韩维却竭尽全力反对。曾布在哲宗元符和徽宗靖国年间，阴谋陷害忠良，而他的弟弟曾肇却写信极力劝诫他。哥哥与弟弟一邪一正的不同，竟有这么大的差异。

第四卷

三竖子

赵为秦所围，使平原君求救于楚，楚王未肯定从。毛遂曰：“白起，小竖子耳！兴师以与楚战，举鄢、郢，烧夷陵，辱王之先人，此百世之怨也。”是时，起已数立大功，且胜于长平矣。人告韩信反，汉祖以问诸将，皆曰：“亟发兵坑竖子耳！”帝默然。唯陈平以为兵不如楚精，诸将用兵不能及信。英布反，书闻，上召诸将问计，又曰：“发兵击之，坑竖子耳！”夫白起、信、布之为人，材能不可掩，以此三人为竖子，是天下无复有壮士也。毛遂之言，只欲激怒楚王，使之知合从之利害，故不得不以起为懦夫。至如高帝诸将，不过周勃、樊哙之俦。韩信因执而归，栖栖然处长安为列侯，盖一匹夫也，而哙喜其过己，趋拜送迎，言称臣，况于据有全楚万乘之地，事力强弱，安可同日而语！英布固尝言：“诸将独患淮阴、彭越，今皆

已死，馀不足畏。”则竖子之对，可谓勇而无谋，殆与张仪诋苏秦为反覆之人相似。高帝默然，顾深知其非也。至于陈平，则不然矣。若乃韩信谓魏将柏直为竖子，则诚然。柏直庸庸无所知名，汉王亦称其口尚乳臭，真一竖子也。阮籍登广武，叹曰：“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。”盖叹是时无英雄如昔人者。俗士不达，以为籍讥汉祖，虽李太白亦有是言，失之矣。

〔译文〕战国时赵国被秦国围困，赵王派平原君赵胜向楚国求救，楚王对是否出兵犹豫不决。平原君的食客毛遂说：“秦将白起，乳臭小子而已！曾发兵与楚作战，攻取了楚国的鄢、首都郢两城，在夷陵破坏楚国先王墓，这是百世难解的仇怨。”当时，白起已立下了很多战功，而且在长平之战中全胜而归。有人告发韩信谋反，汉高祖刘邦就这件事向各位将领询问解决办法，大家都说：“应该立刻发兵活埋这个



汉高祖刘邦像，图出自清·上官周绘《晚笑堂画传》。

臭小子！”高祖默然无语。只有陈平认为汉军没有楚军精干，各位将领用兵的本领也根本无法与韩信相比。英布谋反，高祖召见各位将领征求计策，将领们又回答说：“发兵攻打他，活埋这个臭小子！”白起、韩信、英布三位将领，具有非凡的才能，把这三个人当做臭小子，天下就没有壮士了。毛遂的话，只是想激怒楚王，让他明白合纵抗秦的好处，才说白起是懦夫的。汉高祖的各位将领，只是周勃、樊哙一流的人物。韩信后来被抓回长安，在惶恐中处于京城为列侯，那时他与一般人几乎没有区别，而樊哙因为喜于他的才能超过自己，趋奉拜谒高接远送，说话必称臣，更何况霸占全楚万辆战车的地盘，形势和力量的强弱，怎么能相提并论！英布曾经说过：“在各位将领中，我只害怕淮阴侯韩信、梁王彭越，现在他们两人全都被杀死了，剩下的没有值得害怕的人了。”“臭小子”这个回答，可算得上是有勇无谋，几乎和张仪诋毁苏秦为反复无常的小人有相似之处。汉高祖默然无语，是深知他们说的都是错误的。至于陈平，则和其他将领不一样。象韩信称魏将柏直为臭小子，一点也不假。柏直庸庸碌碌名不见经传，汉王也称他为口中尚含乳臭，一个真正的臭小子。三国时阮籍登上广武山，叹息说：“时代没有英雄，使臭小子成就功名！”这是感叹他那个时代没有出现象古代那样的英雄。世俗之人不懂得事理，以为阮籍是在讥讽汉高祖。即使是李太白，也有这样的说法，此话说得是错误的。

枢密称呼

枢密使之名起于唐，本以宦者为之，盖内诸司之贵者耳。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职，遂与宰相等。自此接于本朝，又有副使、知院事、同知院事、签书、同签书之别，虽品秩有高下，然均称为枢密。明道中，王沂公自故相召为检校太师、枢密使，李文定公为集贤相，以书迎之于国门，称曰“枢密太师相公”，予家藏此帖。绍兴五年，高宗车驾幸平江，过秀州，执政从行者四人，在前者传呼“宰相”，赵忠简也，次呼“枢密”，张魏公也，时为知院事，次呼“参政”，沈必先也，最后又呼“枢密”，则签书权朝美云。予为检详时，叶审言、黄继道为长贰，亦同一称。而二三十年以来，遂有知院、同知之目，初出于典谒、街卒之口，久而朝士亦然，名不雅古，莫此为甚。

[译文] 从唐代开始，枢密使本来由宦官充任，为宫内各部门中的贵幸者。五代开始由士大夫担任，其地位和宰相相等。从五代直到宋代，又有了枢密副使、知院事、同知院事、签书、同签书的区别，虽然品秩有区别，但是都称为枢密。仁宗明道年间，王沂公以前任宰相被召出任检校太师、枢密使，李文定公任集贤相，招贴到衙门外迎接他走马上任，称呼“枢密太师相公”，我家珍藏着这份书帖。绍兴五年，高宗皇帝巡幸平江，经过秀州，跟随高宗皇帝巡行的有执政四人，走在最前面的传呼“宰相”，指赵忠简，下一个呼“枢密”，指张魏公，那时他担任知院事，第三个呼“参政”，是沈必先，最后一个又呼“枢密”，是指枢密签书权朝美。我任检详时，叶审言、黄继道一任长官一任副职，也是同一个称呼——枢密。只是近二三十年，“枢密”逐渐有了知院、同知的别名，起初迎宾者、街巷平民这样称呼，时间长了朝中士大夫也这样称呼了，名称鄙俗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